

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A/33/114
S/12719
26 May 197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 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暂定议程项目一览表 * 项目 28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三年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荣幸地附上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奈尔·阿塔莱先生写给你的信。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大会暂定议程项目一览表项目 28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散发，则不胜感激。

常驻代表

大使

伊尔太尔·蒂尔克门 (签名)

* A/33/50/Rev.1.

A/33/114
S/12719
Chinese
Page 2

附 件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奈尔·阿塔莱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我荣幸地附上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八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统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阁下给阁下的信件全文。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大会暂定议程项目一览表项目 28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散发，则不胜感激。

代表

奈尔·阿塔莱 (签名)

附 件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八日

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我荣幸地向你提到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日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在联合国的所谓“常驻代表”齐农·罗西季斯先生写给阁下的信，该信曾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作为联合国文件(A/33/74-S/12626)散发。

令所有真正希望看到塞浦路斯问题获得和平解决的人都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当土耳其和土族塞人尽力正在促成这种解决的时候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和它的邦凶却发动了恶意、破坏而又完全虚构的反土耳其运动，他们明白表示无意同土族一方开始进行认真的谈判，更谈不上达成什么和平的政治解决办法了。在土族塞人一方提出一个谋求公正、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新和平建议的前夕，直到最近还声称塞浦路斯问题是从一九七四年的土耳其干涉引起的，齐农·罗西季斯先生却在上述的那封信中，除了把他那众所周知的有关一九七四年事件的指控重述一遍以外，几乎把一九六三年以来的一切有关问题都重新扯上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决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

罗西季斯先生为了企图消除土族塞人的存在及其在塞浦路斯作为共同建立共和国的伙伴的平等权利，就非常习惯地将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贬称为“土耳其虚设的一个所谓的邦”。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存在并不归功于罗西季斯先生给予的承认，而是要归功于土族塞人所具有的自由民主的意志；土族塞人应当拥有与希族塞人同样的政治地位的权利。

土族塞人并不需要将塞浦路斯村镇的希腊名称“消除掉”，或以任何其他提出的理由来证明土耳其人也存在于该岛上。同时也没有任何象罗西季斯先生在他信中所诬告的“对塞浦路斯长久历史和文化的侵犯”。事实证明这种狡猾的策略在过去都是希族的特征而不是土族的特征。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我们给阁下的信（见 A/33/72-S/12621）很清楚地解释了北部土耳其区域内若干村镇采用土耳其名称的理由。该信指出，塞浦路斯自一五七一年起就是两个民族两种语文的岛屿，岛上许多村镇都是按当地居住的是那一族人民而分别用希腊文或土耳其文的地名。有些村镇同时有两个地名，一个土耳其文的，一个希腊文的，反映出塞浦路斯传统独有的两个民族的特性。下面是几个例子：

<u>希腊名称</u>	<u>土耳其名称</u>
Ay Dhometios	Incirli
Asha	Paşaköy
Dhyo Potami	Ikidere
Epikho	Abohor
Omorphita	Küçük Kaymakli
Kalokhorio	Çamlıköy
Kythrea	Değirmenlik
Karavostassi	Gemikonağı
Minzelli	Ortaköy
Trakhonas	Kizilbaş

故意而动机不良地更改乡村、街道的土耳其名称是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在一九六三至一九七四年动乱年代使用的一惯手法。在许多情况之下，这些地区随同它们的名称一并去掉，以望消灭岛屿上一切土耳其的痕迹。尼科西亚的历史性“贝拉克塔尔广场”在其清真寺被多次轰炸之后被重新命名为英雄广场；希族塞人当局使用开土机铲平了历史性的土耳其古迹和坟墓。

自一九六三年以来塞浦路斯发生了不少事件，因为希族塞人，在希腊的协助下，设法将塞浦路斯“希腊化”。作为扎根于希腊煽动希塞统一运动的民族间隔离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两个民族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希腊政变所引起的事件之后重新组成了岛屿上两个单独地区。因此，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强迫土族塞人脱离政府当局后的行政上的分离带有实质上的地理性质。将两个民族重新组成岛屿上两个单独地区的行动，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二日在维也纳举行，由阁下亲自主持的第三轮民族间会议所达成的人口自愿交换协定之后而完成。后来在土族塞人地区进行的重新定居和重建工作迫使若干村庄重新采用土耳其村名，这些村庄是希族塞人退出来的，本来只有希腊名称。但这不表示消灭各村的希腊名称，因此更改传统名称的问题并不发生。

但确实发生了的问题是：希族塞人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接受在一个双民族，双语言的国家里，某些地点必然会有双语名称的现实？他们什么时候才肯接受在今天的塞浦路斯存在着双区域的安排，而且在塞浦路斯问题有一个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之前土族塞人是他们区域里唯一合法的主人？

罗西季斯先生想要轻描淡写地解释土族塞人自一九六三年以来所经历的压迫和苦难，而大大夸张希族塞人今天所遭遇的困难，是一点用也没有的。我向他挑战，要他反驳联合国报告和世界新闻报刊的下列摘录：

关于“未经证实的猛烈攻击”和“零星事件”：

“今晚我们前往尼科西亚被封锁起来的土族居民区，过去五天中，那里曾有二百到三百人被人屠杀。我们是到那里去的第一批西方记者，我们看到了罄竹难书的可怕场面，我们也看到了极其可怖的景象，人们似乎被吓得欲哭无泪，只是在那里歇斯底里地和沉默地傻笑，这比流泪还要可怕。”（《每日快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我在一个澡盆里看到被谋杀的一个母亲和她的三个小孩的尸体，只因为小孩的父亲是一个土族军官……………。”（《费加罗报》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

“今天晚上，沉默的人群集结在尼科西亚土族区的红新月医院外面，看着被发现草草埋在13英里外的圣瓦西利奥斯村外的九具土族塞人的尸体，在伞兵团的护送下送往该医院。另有三具尸体，包括一具是妇女的，也在附近发现，但却无法移动。在伞兵保护下的土族塞人，仍试图找出据说埋在同一地点的二十多具尸体。据说这些人都是于圣诞节时在该村附近发生的战斗中被杀害的。”（《每日电讯报》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

“联合国军对全岛在纷扰期间，包括提立里亚战斗期间，所受的一切财产损失，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在一〇九个村落中，其中多数为土族塞人村落或混合村落，有五二七所房屋被毁，另有二千家被抢劫而遭受破坏。在克提马，有三十八所住宅及商店全毁，另一二二所部分被毁。在尼古西亚的欧茂非塔郊区，有五十所住宅全毁，另在该地及毗邻郊区有二四〇所住宅部分被毁。”（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联合国第S/5950号文件，第180段）

关于人权：

“……似仍可作出结论，对塞浦路斯土族塞人社区强加的经济限制，在有些地方严厉到等于封锁，显示塞浦路斯政府（希族塞人）企图以经济压力代替军事行动，强求解决。”（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联合国第S/5950号文件，第222段）

“官方设限的货物名单，仍有三十一个项目。但是，其中大部分货物都有很广泛的平民用途，例如建筑材料和汽车替换零件等。此外，不在官方名单但可列入类似标题下的其他项目，也往往在〔希族塞人〕塞浦路斯警察检查站被没收，引起人们的控诉。”（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联合国第 S/7350 号文件，第 111 段）

“封锁行动在降为非人生活标准和眼看就要发生的饥饿威胁之前，好象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全面战争的替代品。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印度司令蒂马亚中将，在岛上的科基纳区域就发现了上述生活情况，那里有一千五百名土族塞人，被马卡里奥斯政府幽禁起来。他的结论得到了岛上国际红十字会瑞士笈会长马克斯·施塔尔德尔证实。”（《纽约先驱论坛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

“过去十一年来，经济、社会和教育的不平等，以及个人生命的毫无安全可言，是两族互不信任和互相害怕的根沅，也是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人口间政治紧张和两区和两族间相互排斥的根沅……。这在土族居民区中，造成了被欺负和被压迫的感觉。这种人道上的苦难是塞浦路斯十一年危机的起因。”（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欧洲理事会第 3600 号文件，第 11 段）

关于“自我隔离”：

“当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骚乱爆发，并持续到一九六四年年初时，数以千计的土族塞人逃离他们的家园，随身只带了他们能够驶走或带走的的东西，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土族塞人村庄或地区去避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联合国第 S/8286 号文件，第 126 段）

“目前，我们正目击着土族塞人从他们的村庄大批外移。数以千计的人，舍弃了他们的家园、土地、牲口；希腊恐怖主义是残酷无情的。这次，希腊人的雄辩和柏拉图的半身雕像，已不足掩盖那种野蛮而残忍的行为。下午四时，他们就对各个土族村庄执行宵禁。一到天黑，各种威胁、射击和企图放

火，就开始发生了。在妇女和儿童无一幸免的圣诞节大屠杀以后，展开任何反抗行动是很难的。”（《今日报》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

“希族塞人宣称，许多土族塞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威胁下，被迫建立大片围地，以图成立一个分开的联邦铺路。但是，对于这个指控，我们还很难找出证据。他们的动机与其说是有计划地企图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不如说是保护自己，不受突然的袭击。”（《每日电讯报》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

此时此际，我要提醒罗西季斯先生，即使是在土族塞人居民区处境如此的时候，土族塞人也没有把分治当作其追求的目标，他们只不过以此作为“对抗物”，来抵制希族塞人居民区的希塞统一要求，和他们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残酷运动。他或许可以引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期间当地土族报纸的言论，来证明土族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分治主义者，这是徒劳的。但是他的理由太不着边际了。希族塞人领导人的希塞统一声明和活动，不仅早在土族塞人提出任何分治要求之前就已出现，而且也比分治要求持续得更久。只有自承老迈才会声称忘记了希族塞人领袖一再作出的希塞统一声明，这些声明一直到一九七三年还不断公开发表，其后并以伪装方式出现。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我发誓，我将为我们民族自由的诞生而努力，绝不放弃使塞浦路斯与希腊祖国合并的政策。”（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日马卡里奥斯当选为大主教时的讲话）

“真的，我们斗争的目标，是为了使塞浦路斯同希腊合并。”（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五日，马卡里奥斯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芬兰新闻》访问时的讲话）

“只有塞浦路斯无条件地并入希腊，才算取得了真正的胜利。”（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马卡里奥斯对希族塞人日报《国民报》的讲话）

“我们认为，要有自由就必须把这个希腊文化的南方前哨，并入塞浦路斯同希腊的民族实体结合体之中。”（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塔索斯·帕帕多普洛斯先生在利马索尔的公开讲话）

“另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是希族塞人必须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他们的民族问题。他们绝不该认为可以把塞浦路斯问题看作是政治问题，这种念头绝不能有。这不是政治问题，不是政党问题，也不是私人问题。对塞浦路斯和希腊来说，这都是民族问题，而解决办法除了‘希塞统一’以外，别无他途。”

“塞浦路斯斗争正经历一关键阶段，现在有一个极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塞浦路斯在国际上现在可以自己发言了。这种有利条件在一九五五年是不存在的。尽管有许多不利条件，但塞浦路斯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它与希腊合并的努力也就比以前容易简捷得多。”（摘自斯派罗斯·基普拉诺一九六七年在利马索尔的一篇演讲，他当时是希族塞人政府的外交部长）。

“塞浦路斯是希腊的。塞浦路斯有史以来一直是希腊的，今后也永远是希腊的。我们接受时它是希腊的、未经分割的。我们要保持它这种情况。并且要照原样把它交给希腊。”（马卡里奥斯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四日在亚卢萨村的演讲。）

“我始终在为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而努力……我的民族信念和民族信心始终不渝。”（马卡里奥斯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九日对法国杂志《论点》的谈话。）

罗西季斯先生过去屡次企图驳斥这些明确的言论，说这些话不是断章取义，就是在“官面堂皇”的场合讲的。但是每当有人要求罗西季斯先生公开谴责“希塞统一”时，无论他或任何一个希族塞人领袖都不敢接受这个要求！同样的，我要在这里引述希族塞人众议院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通过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现在继续有效，因此使人不能不相信希族塞人对于“希塞统一”运动确是怀抱了不可动摇的信念：

“为了阐明塞浦路斯希腊人的长久愿望，众议院宣布：尽管有许多不利情况，它决不中止正在进行的、受到全体希腊人支持的斗争，直到这个斗争取得胜利，使整个未分割的塞浦路斯与祖国合并，而不需经过任何中间阶段。”

面对希族塞人行政机构这个自己承认的官方“希塞统一”政策，土族绝对不怀有分割塞浦路斯或将土并入土耳其的任何野心。罗西季斯先生引述一位前土耳其总理（现已死亡）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土耳其国民议会所讲的话：“站在官方立场，我们提倡联合邦的概念而不提倡分割的论点，为的是看起来好象符合条约的规定，”他是想竭尽所能来证明塞浦路斯过去确曾发生过分割的问题。但是他旧调重弹的企图注定是失败的。如果他真心诚意地想保持塞浦路斯为两族独立的单一国家的地位就应该首先改变他本身领导方面口是心非的立场，就是视情况需要，把“自决”和“希塞统一”交互替用，已经成了习惯，同时也是避免引起全世界公众舆论的反应。

希腊要求把塞浦路斯问题列入一九五四年大会议程时，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是很显然的。在要求中，“自决”和“希塞统一”两词被当作同义语使用。由于这套手法荒谬，联合国拒绝这项要求。此后希族塞人领袖用“自决”的时候比较多，但只是作为在国际讲坛上避免使用“希塞统一”的一种花招而已。这种技巧的改变在大家知道的“阿卡里塔斯计划”阐释得很清楚，该计划的目的是要以“希塞统一”做幌子来解散共和国和摧毁土族塞人。下面我转载了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希族塞人《祖国日报》所刊登的该项计划的有关部分：

“一般说来，显然今天的国际舆论是反对对少数民族进行任何形式的压迫的。到目前为止，土耳其人一直都能使全世界公众舆论相信塞浦路斯如与希腊合并等于是使他们沦为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用‘自决’而不用‘希塞统一’作为我们斗争的基础，就很可能影响全世界公众舆论而对我们有利。但是为了能在不受任何妨碍的条件下充分行使自决的权利，我们首先必须摆脱各项协定。”（如保证条约、联盟条约等）。

下面就是已故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对希族塞人的《自由日报》谈话时如何在国内对他本国人民解释这个模棱两可的名词。大主教的话是答复有人批评大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的不结盟国家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认为决

议中应直接提到“希塞统一”，他说：

“有人说这项决议草案应该清楚地说明自决——希塞统一，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向联合国提出‘措辞待定的文书’。但是为了使人理解文书的内容，必须用叫人看得懂的措辞。在联合国的语言和词汇里，‘自决’一词适用于非自治领土，而‘希塞统一’一词是这个世界组织的名词中所没有的，也不是属于它管辖的论题。”

希族塞人在谈到希塞统一——分治问题时表现的毫无诚意，这在罗西季斯先生对土族塞人抵抗组织的指控中到处可见。这个组织正如其名称所示，纯粹是为自卫而成立的，目的在于抵抗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这个希族塞人以前为希塞统一而成立的地下组织对岛内土族人采取的恐怖活动。罗西季斯先生带着侮辱的口吻说：“土族塞人领导人同土族塞人抵抗组织串通一气，恐吓土族塞人老百姓，要他们完全服从其命令。”这暴露了他对我们土族是多么地不尊重！他应该是第一个知道，如果土族屈服于恐吓和威胁，希腊人老早就完成了希塞统一了。

应当指出，自从塞浦路斯问题这个悠长的历史揭开以来，土族塞人不得已而采取的每一行动，几乎都是为了对付在此之前希族塞人根据希塞统一的政策所采取的行动。土族塞人除保护其在独立的塞浦路斯的生存和合法权利外别无其他意图，自从塞浦路斯问题发生以来，他们就处于防御的地位，反对侵略扩张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一直试图以武力剥夺他们的这些权利。土族塞人抵抗组织成立的原因也不过如此而已。罗西季斯先生不能期望土族人毫无动静，任由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集体宰割！

我们请罗西季斯先生听一听土族塞人老百姓抗议希族塞人对他们采取不人道行为的呼声，这样他才会了解到底是谁“恐吓”他们并试图逼使他们屈服：

“我们坚决不向试图对土族施加空前暴行和恐怖行动的马卡里奥斯屈服，也不在他面前退缩。土族塞人青年已把全付精力抗入这场争取人权和尊严的斗争中”。（摘自塞浦路斯土族青年理事会在希族塞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屠杀二周年纪念的纪念日文告）

“土族塞人工人应确保土族对希族塞人行政机构的抵抗，这是他们的爱国责任。希族塞人行政机构正在把每一种非法行为都当成是合法行动，目的是侵犯土族塞人的权利，使他们沦为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二等公民，并把塞岛同希腊合并……既成事实、压力、暴力方法、经济限制、封锁和压迫行为等是我们的敌人所掌握的最有力的手段。但是，土族塞人的团结和决心，以及他们的事业的正义性，至今为止使希族塞人的措施到处碰壁。”（摘自塞浦路斯土族人工会联合会的劳动节公告，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发布）

“塞浦路斯土族公务员社执行理事会审查了以违宪方式颁布的所述法律（希族塞人行政机构于一九六五年非法制定的新的公众服务委员会法），认为这项法律是非法的，是通过不正当手法炮制出来以便巩固希族塞人行政机构迄今为止为剥夺土族公委员的既得利益和宪法权利而采取的专横的、歧视性的和违宪的措施……”

“执行理事会也叫我再次通过阁下向秘书长呼吁，请他采取一切他认为必要的行动，以终止土族公务员因希族塞人行政机构的违宪和歧视性行动而遭受苦难。”（摘自塞浦路斯土族公务员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给当时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伯纳德斯先生的信。）

以上所说已明白显示罗西季斯先生所谓“自我孤立”的论点和据说土族塞人抵抗组织在这种孤立情势中所起的作用都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罢了。事实上，只有象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这类的恐怖主义组织才会对其本族构成“威胁”和“造成严重打击”，对于那些反对希塞统一、赞成独立的族人，尤其如此。我们应当记得，在这个组织刚成立的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〇年期间，有四百名左右的希族塞人和许多土耳其人及英国人由于反对希塞统一而遭这个组织杀害。这个组织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希腊政变中发挥了主导的作用，成千上万的希族塞人在那次政变中被自己的同胞残杀；只要举出这一事实，我们就几乎不需要再进一步地证明这个组织能够做些什么了。就如马卡里奥斯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在安全理事会所共开指出的，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第二期），也就是该组织的扩充部分，曾因选择达成希塞统一的方式而同主教政权发生争执，勾结了希腊军政府和希腊驻塞浦路斯的军官一起发动这个政变：

“希腊军事政权残酷地侵犯了塞浦路斯的独立……希腊军政府将其专制统治扩展到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警察所得到的文件清楚地显示，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第二期）是雅典政权的一个附庸……”

“我还不知道关于希腊军事政权所造成的塞浦路斯危机的全部详情。我想，伤亡人数恐怕不少，物质损害也很严重……”

故主教已充分说明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要求土耳其履行其《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以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以免受到蓄意破坏，并且使土族塞人免于大屠杀的浩劫。

希族塞人有理由对他们长期鼓动希塞统一运动而造成今日的困境感到悲哀。但是，他们应了解到，比较而言，土族塞人在塞浦路斯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受害较大。他们试图把犯错的责任推到土族塞人身上，并且为了政治利益而利用和夸大他们的问题，姑且不论其产生的反作用为何，实在是毫无用处的。他们也许可以暂时欺骗一些人，但却无法永远欺骗所有的人，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几乎一个星期过去了，但国会和各慈善组织的代表都没有前往访问。有人如实地请他们看了 14,000 个住于帐篷的难民。他们采访了同样令人心碎的一些案例。无庸赘言，没有人告诉他们，难民可以住在英国军队所撤出的一些牢固的房子里。

马卡里奥斯至少要一些难民住在帐篷里。事实上，当局很难使 14,000 难民不逃至更舒适的避难所里去。”（摘自《芝加哥每日新闻》，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当克利福德先生走进一坐很长的、用作难民儿童学校的帐篷时，他碰到了一打哭哭啼啼的中年妇女。其中一名妇人被推到前面，一边啜泣一边向他展示她丈夫和儿子的相片，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在战火爆发后失踪了……”

当克利福德先生走过这名妇人和其他妇人的面前，坐上汽车离开时，她们都嚎啕痛哭。然后，这名妇人的眼泪一下不见了，在同其他妇人一道乘公共汽车回家之前，她向卡特先生的代表微笑招手。”（合众国际社，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由此看来，我们并无意尽量减少或忽视今天希族塞人所遭遇到的种种问题。然而，应当强调的是，塞浦路斯问题人道主义方面如何解决，要看这个问题在政治方面如何解决而定，两者不能孤立地分开处理。在这方面，土族塞人同过去一样，尽其分内职责，提出了新的和平提议，以求通过两族间的谈判对这个问题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些提议，“具体地并在实质上，从宪法方面和领土方面处理塞浦路斯问题”。这点阁下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在阁下同我们的顾问在维也纳进行的讨论于四月十五日结束时所发表的公报中也曾予以指出。我们诚挚地希望，希方将对这些提议作出积极的反应，以便有可能恢复两族间的会谈，从而在塞浦路斯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则不胜感激。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统

腊乌夫·登克塔什（签名）